学校代号 10536　　　　学　号 11114011112

分 类 号 I222　　　　密　级 公开



硕士学位论文

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刘　康

培 养 单 位　长沙理工大学

导师姓名及职称　成松柳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古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唐宋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4年4月

学校代号：10536

学　　号：11114011112

密　　级：公开

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刘　康

导师姓名及职称　成松柳教授

培 养 单 位　长沙理工大学

专 业 名 称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4年4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14年6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刘再华教授

The research of Tang Poetry's "Hu-Hua"

by

LIUkang

B.E.(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Changsha University of Literature & Law

Supervisor

Professor Cheng SongLiu

April,2014

长沙理工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刘康　　　　日期：2014年 6 月 6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长沙理工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在_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刘康　　　　日期：2014年 6 月 10 日

导师签名：[illegible]　　　　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盛唐是我国诗歌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诗歌表现内容日趋丰富。其内容的丰富离不开唐人生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李唐一族对外实行开放和包容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又造就了唐人自信开放的心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胡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习俗得以流畅地呈现在唐人面前，继而被唐人所消化和吸收。诗歌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和反映，昂扬向上的盛唐气象造就了盛唐诗歌的大气磅礴，缕缕“胡风”和“胡气”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诗”与“乐”总是相伴相生。盛唐时期的乐舞呈现明显的“胡化”倾向，由此导致了盛唐诗歌“胡化”现象。这一时期的诗歌与胡地乐舞呈现相伴相促的景象，即诗歌中既有关于胡地乐舞的描写，同时胡地乐舞也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塞外地理文化景观以及文化习俗也为盛唐诗歌“胡化”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岑参笔下，边塞迥异的地理气候景观得以完整的呈现。此外，伴随民族大融合，胡人的葡萄酒、胡姬酒肆、饮食、服装以及风俗节日也被诗人所接受，进而吸纳到诗歌创作之中。这些景象都形成了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的又一表现。

在感受外来物品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外，唐人的精神风貌也受到“胡风”和“胡气”的影响，他们摆脱了统治阶级对游侠风气的打压，形成了一种崇尚勇武，以疆场拼杀赢取功名的观念。由此，盛唐诗歌多表现出崇尚武力，希望投身边塞舍生取义的倾向，这也是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的另一表现。

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研究是理解和认识盛唐诗歌繁荣的重要方面。它展示了唐代诗歌繁荣背后是民族融合给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动力。

关键词：盛唐；诗歌；胡化；乐舞；民俗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hold Tang is the most prosperous tim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tent of poetry became richer and richer. Th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pen and pluralistic living environment of Tang. For national minority, Tang Dynasty carried out open and inclusive national policy. What's more, the strong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offered people an open and confident mind. In such social environment, habits and culture of national minority presented to Tang Dynasty people smoothly, and then digested and absorbed by Tang Dynasty people. Poetry record and reflect social life, high-spirited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created majestic poetry. "HuFeng" and "HuQi" bring great vitality to Tang Dynasty poetr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oetry, "Poetry" and "Music" are always concomitant together. Tang Dynasty Music and Dance presented phenomenons of "Hu-Hua" obviously, which led poems to have the phenomenon of "Hu-Hua". During this period, poetry and music developed together as well as promoted each other, which mean that poem descript the music and dance from national minority, while the music and dance from national minority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The geography and cultural practic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provided sufficient nutrients for the "Hu-Hua" of Tang Dynasty poem. Censen's poem describ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nd climatic scenery of frontier fortress completely. In addition, with National Fusion, wine, Hiji , food, clothing, and festival customs of national minority also accepted by the poet, and then absorbed into the poetic creation. These aspects formed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Tang Poetry's Hu-Hua.

Except the change in lifestyle that bring from foreign goods, spirit of Tang people also influenced by "HuFeng" and "HuQi". They get rid of suppressing of the Ranger ethos from the ruling class, and formed the idea that respect martial and win the fame from battlefield grappling.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became to glorify martial fame and express the hoping to join the frontier fortress troops, sacrificing for the country. This is another performanc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m's "Hu-Hua".

The research on Tang Dynasty poetry's phenomenon of "Hu-Hua"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cognize th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poetry. It shows that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the power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cultural.

Key Words: Hold Tang; Poetry; Hu-Hua; Music and Dance; Culture Practice

目录

引言

一 选题缘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漫漫历史长河中，唐诗无疑是璀璨银河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这段话从诗人队伍、诗歌风格和体裁三方面总结了唐诗繁荣的景象。

在后人心目中，唐诗一直代表着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唐诗繁荣因素的专家学者很多，也有一些公认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归于政治、经济、文化几点。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之外，西域胡地传入的音乐、舞蹈以及胡风、胡俗对盛唐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云："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钜，自不待言。"[②]梁启超说："唐代放射异彩的诗歌，是经过一番民族化合以后，到唐朝才会发生。那时的音乐和美术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响，文学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③]闻一多说："南朝的文学传统是衰老的、贫血的……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够拯救他。"[④]可见，外来少数民族对唐代社会历史诸方面影响的深入和全面。唐诗中有大量反映外来文化的诗歌，更有大量受胡地文化影响而创作的诗歌，它们是唐诗博大丰富的重要体现，是唐诗璀璨夺目的亮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胡汉文化交融对唐诗创作产生之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现代学者余恕诚、鲍鹏山在《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一文中讲到："唐诗是

①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6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321页
③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08页
④ 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14页

一座富矿，唐代民族题材的诗歌也是一座富矿，我们期待着唐代民族题材诗歌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成为唐诗学和民族学研究中新的亮点。”[①]

在述及唐诗“胡化”现象研究之时，有学者将研究眼光放到边塞诗的研究当中。诚然，边塞诗是体现民族关系和名族融合的最佳研究对象，众多边塞诗人诸如李白、岑参、高适等均有边塞生活的切身经历，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有着大量反映胡地文化习俗的优秀诗篇。然则对于诗歌“胡化”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边塞诗之上。盛唐时期的民族交往是全方位的。首先，在政策上，李唐统治者皆有鲜卑族血统，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物品和风俗有着天然亲近之感。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李唐王朝采取平等态度，唐高宗极力主张要实行民族平等，即“爱之如一”的政策，他否定了“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他认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应该是一样的，统治者若鱼肉百姓，那是禽兽所为。他曾表示:“百姓(汉族)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②]其次，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时候，李唐统治者则采取的是吸收和容纳的态度。在唐王朝的宫廷乐舞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少数民族，唐玄宗更是胡地乐舞的忠实粉丝，他不仅精通音律，更是将胡乐升为坐部伎。不仅仅是上层统治者，市井当中对外来文化也是趋之若鹜。在这样的政策环境背景之下，唐与周边各民族之交往可谓空前繁盛，各民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不仅仅是长安，扬州、广州等地也是胡人跟胡商云集，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外来物品，更为唐代文人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胡歌、胡舞、胡姬、酒肆、胡衣、胡食、胡俗，这些东西极大地满足了唐人的猎奇之心。文化交融的结果毫无疑问地反映在诗歌创作当中。由此，民族交融对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边塞诗当中，还有更多的诗歌描写景物虽不是边塞、也非胡人，但这些诗歌却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对于这方面诗歌的研究笔者认为是可以做、也是应该做的，由此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胡汉文化交融对唐诗创作产生的深远和巨大的影响。在本篇中称之为诗歌的“胡化”现象。

诗歌“胡化”现象是指在民族融合背景之下，胡汉民族在人员和文化往来过程中，胡地人文景观、地理景观以及精神风貌等要素对唐人生活状态以及精神风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进而将这些影响转化到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诗歌精神风貌当中，从而使诗歌表现出一种胡地气息。文章欲以盛唐诗歌在民族融合过程被“胡风”

[①] 余恕诚，鲍鹏山. 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2009(1)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00页

和“胡气”所影响而产生的“胡化”倾向，为民族融合与唐诗创造研究理出一条脉络。

文章研究对象主要为盛唐诗歌的“胡化”现象。之所以选择盛唐诗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盛唐诗歌是唐诗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同时也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后世所仰慕的大家。此外，盛唐时期的李唐王朝处于政治、经济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交流也最为活跃。故本文以盛唐这一时期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关于盛唐这一概念的界定，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①]关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肇始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定型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此盛唐之盛也，大历贞元中，……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②]

故现在一般所说的初盛中晚的时限大致是：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为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本文所指盛唐诗歌是指“诗之盛唐”，即主要创作在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间的诗歌。唐诗的分期与历史的分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点不能混淆。相对于世之盛唐，诗之盛唐则显得姗姗来迟。

此外，笔者对“胡化”之“胡”也做了界定。在《汉书·匈奴传》中，汉武帝时的孤鹿姑单于曾致书自称为“胡”：“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③]魏晋以后“胡”字应用范围变广，活动于中原之外的各少数民族皆被称之为胡。但在唐代，胡主要指西域少数民族，而所谓的“胡风”和“胡气”则主要指西域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气。本文所采“胡化”亦是指西域各少数民族“胡风”和“胡气”对盛唐诗歌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当然，在本文中，某些地方可能会将此范畴放宽，即包含一些虽受“胡气”影响，但是在

---

①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第2页

② [明] 高棅. 唐诗品汇·总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第8页

③ [东汉]班固. 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2796页

地域上不一定出自西域的事物。

二 研究现状

（一）学术专著

目前，对于西域外来文明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介绍和论述了西域诸文明在长安的盛行情况；美籍学者爱德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系统地梳理了唐代社会出现的种类繁多的外来物品；赵明善的《唐代西域乐舞的流行》重点介绍了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和流行情况。他们以严谨和务实的态度考证了唐代社会中的诸多外来文明。关于民族与唐诗创作的学术著作有余恕诚先生的《唐诗风貌》，该著作不仅详细介绍了唐诗的整体风貌以及不同时期各重要诗人、诗派的创作，更是联系实际生活，寻找唐诗创作与特定文化背景和诗人创作心态间的联系，发人所未发。

（二）学位论文

有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注意到了外来文化因素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但其注意点往往在边塞诗歌的研究，例如：崔玉梅《盛唐边塞诗中的战争与和平主题研究》、薛隽雯《唐代各族和平交往边塞诗研究》。唐诗研究涉及到外来文化研究问题，我们一般都会引出“离不开边境”的边塞诗，但文化并不只限于在边境。从题材上看，边塞诗有着明确的创作范畴，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诗歌所受到的“胡风”和“胡气”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边塞诗这一框架之下，还应该有诸如各种民俗、乐舞、民族精神等文化和精神的交流。因此，边塞诗研究应包含在唐诗“胡化”现象研究之中。

另外一部分关于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主要着眼于某个少数民族文化因子对于唐诗创作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有：赵娜《唐诗中的胡姬形象研究》、崔筠《唐诗中的胡人形象研究》、陈佩枝《盛唐诗歌中的盛唐女性研究》、胡拥军《盛唐诗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阐释了少数民族风气对于唐诗创作的影响。

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关于民族关系互动中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如：张翠平《唐代前期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互动研究一以长安为例》以民族互动对于长安产生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李亚静《唐代西北民族关系与唐诗创作》以唐代与西北各民族交流过程中西北各民族文化对于唐诗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刘红伟《盛唐诗歌与西域文化研究》以探讨盛唐诗人诗歌中西域文化风情对诗歌创作题材与精神取向方面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但在民族碰撞过程中，边塞的壮丽雄伟风光对诗人创作内容以及创作精神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戍边思乡体裁的诗歌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三）期刊论文

对盛唐诗歌创作与“胡风”和“胡气”间的研究，学者余恕诚、鲍鹏山在《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于诗歌关系研究》中明确提出，当前学术界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存在不足。有关民族关系与诗歌创作的影响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唐代民族交往研究的论文：熊德基的《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吴逢箴的《唐代诗歌与民族交往》、郑传锐、王树森、余恕诚的《论唐代对外交往诗歌的文化意义》、王树森、余恕诚的《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王艺璇的《论岑参边塞诗与西域文化相互契合的意义》、侯群香的《唐代边塞诗歌中的边城风采》以及李亚静的《唐代西北民族关系下的边塞诗创作》、《唐代西北民族关系下的乐舞诗创作》、《西北民族文化互动与唐诗创作》等。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对唐诗创作影响的论文：高建新《“胡气”与盛唐诗》，徐惊奇、陈霄羽《“胡风”与唐代酒文化》，丘继业《唐朝诗人笔下的“胡姬”》，乌尔沁《外来民间文化的使者“西域胡姬”—唐诗胡姬形象解析》，孙立峰《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王松涛《从胡舞的流行看盛唐气象的多元性与延续性》，田峰《从唐诗看唐代胡姬酒肆及其文化》，许序雅《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论述》、李维《李欣边塞诗的胡乐意象与任侠情结》，王松涛《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等。

由此看来，唐代民族关系对盛唐诗歌的影响，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探讨，民族关系的碰撞不仅产生了边塞诗、和亲诗，民族文化习俗以及民族精神对盛唐诗歌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三 研究方法和意义

本研究主要采取诗史互证的方式进行研究。

首先收集和阅读有关盛唐时期民族融合和交流的书籍，主要阅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史书典籍，了解盛唐时期政治文化背景；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全唐诗》中盛唐诗人的诗歌进行阅读，抓住“胡化”这一关键词进行分类整理，

梳理出在民族融合大背景下，盛唐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胡地文化特征，诸如胡歌、胡舞、胡马、胡食、胡服等等；最后，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论文。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全面地梳理西域人文、地理等因素影响下的盛唐诗歌创作，不仅将边塞诗这一体裁纳入研究范围内，同时也对民族融合过程中，西域地理风貌、乐舞、风俗、风气对唐诗创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 盛唐诗歌“胡化”之政治社会背景

盛唐诗歌大气磅礴，这一方面与其强大的国力有关，同时与其开放的政治社会背景相联系。首先，在政治条件上，唐前期在制定民族政策之时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出发，以历朝民族政策为依据，实行一套更加开明和平等的民族策略。这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良好基础。此外，唐代社会格局的开放性以及唐人心态的自信豁达为“胡风”和“胡气”的传入提供了条件。笔者在论述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在外，初盛唐时期统治阶级对外实行开明和包容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对于胡地文化习俗的传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融洽的民族交流政策可以极大的促进民族间文化融合；对内，唐代社会大量接受少数民族内附，各阶层唐人对胡地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外来文化不断被唐人所接纳，进而被吸收到诗歌创作当中。

1.1 义在羁縻 宜与和亲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在此期间纵有朝代更迭、政权交接，但民族关系的处理始终凝聚着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智慧。民族关系关系到一个朝代的兴衰，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于缓和民族冲突和化解民族矛盾发挥着重要作用。唐王朝在建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在内，战乱初平，桑农咸废；在外，突厥控弦百万，雄踞北方。内不修则无以生存，外不平则国难立。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唐王朝统治者以其阔达的胸襟采取了“偃武修文”、“怀柔远人”的政策。唐朝在建国之初，高祖便下诏明确了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其诏曰：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弹。联抵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分内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1]

由此可知，在民族问题上，唐王朝采取的是“义在羁縻”和“宜与和亲”的策略。

[1]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镇抚夷狄诏(卷一二八)[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第708页

1.1.1 义在羁縻——以夷治夷

中国历代的帝王自诩为“天子”，乃替上天管理世间万物。不管其种族何如，都应该是其子民。据《礼纪·王制》记载，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谓之“中国”，而生活在中原之东西南北四方的少数民族则称为“夷狄”。这便是“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的说法。“五方之民”这一整体中纳含了“内中华”和“外夷狄”这两方面。羁縻制便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形成了。

我国的羁縻制，始自秦汉，在李唐时期，羁縻制度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习俗与汉人均有较大差别，加之当时交通不便，路途遥远，统治者很难实施集权式的中央统治。因此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唐朝统治者分别设置羁縻府、州、县，依俗而治。唐朝统治者之所以“因俗而治”和“以夷治夷”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①]据《新唐书·地理志》云：“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②]唐朝的这种依俗而治的政策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唐代对西域各民族主要采用的是三州四镇两都护府的羁縻府州模式，并在开元年间达到顶峰。这里所指的三州是：伊州、西州、庭州。

伊州为高宗平定高昌之后在今新疆哈密境内设置，之后又在天山以南和天山以北相继设立了西州和庭州。各州相互独立，有各自州刺史，下辖若干县。经贞观到开元年间的治理，三州经济和人口都得到很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原各县的州县制度也推广到三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西州的均田制。“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侯君集平高昌。九月，即进行勘查户口、土地的工作。此后，大约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廷在派出使者巡抚西州，迁移西州部分百姓于内地，迁徙流人等入西州的同时，也正式开始了把西州田制纳入均田轨道的行动。”[③]

两都护府是指安西都护府以及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于贞观十四年设置，后于显庆三年升为大都护府。之后其名称及治所多有变动。北庭都护府于长安二年设置，景龙三年

---

①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地理志（卷三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960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十三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19页
③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论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页

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两大都护分制西域南北。唐代都护“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①]此外，作为安西都护的派出机构，安西四镇在稳定西域社会，安抚百姓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安西四镇的功能是镇守防治，采取军政合一形式，其士兵及将领为汉蕃搭配。安西四镇与安西都护一样，由于形势和政策变化，其废置也多有反复。

唐代建立羁縻州之后，中央政府便通过使臣往来、敕封、巡边以及朝贡等方式，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周边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西域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便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胡汉民族一体化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建立更是为各种产品交换和频发的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唐朝与吐蕃建立的茶马互市是这一政策成功的典范。据说茶叶最初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一经传入，茶叶便在吐蕃各个阶层广为流传。巨大的需求为胡汉商人都创造了商机，一方面汉族商人将茶叶带到吐蕃以换取各种畜产品及马匹；另一方面，大量的吐蕃商人将各种畜产品运往内地，以换取所需要的布匹、陶瓷、茶叶等物品。不仅是商人，很多吐蕃使臣也被这巨大的商业利益所吸引，在出使同时与中原内地做起了生意。例如武则天时期，吐蕃一入朝出使使人上书说，素来知道天朝物产丰富，仰慕唐朝丝绸、棉布以及弓箭等物品，希望可以开市交换。当时的朝廷认为：“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②]茶马互市对增进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当时互市范围而言，上至官方，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参与其中。在交易物品种类、交换额度以及参与人数上，当时的茶马互市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茶马互市对于胡汉民族而言都有着极大的好处，中原人通过互市可以获得马匹、牲畜以及各类皮制用具，少数民族则通过互市可以交换到各种生活必需品。

1.1.2 宜与和亲——君臣厚义乡

和亲政策在中央政府保持和改善与各少数民族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春秋战国开始，和亲政策便一直存于历朝历代。至唐则成为其民族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为民族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太宗曾明确指出：“遂其来请，结以

[①] 杜佑.通典（卷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896页

[②] [唐] 张鷟著，田涛，郭成伟校注.龙筋凤髓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第 60 页

婚姻，缓鬐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①]比较成功以及影响较大的是唐蕃和亲。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弄赞(即松赞干布)嗣位，帝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弄见德遐，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资金宝，奉表求婚。”[②]当时唐太宗并未答应。贞元十四年(640年)，为表诚意，吐蕃再次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和亲，并且献上珍宝古玩数百，黄金5000两。最后唐太宗命礼部尚书王道宗主婚，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这也开启了唐蕃和亲的先河。此后又有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金城公主出嫁之时，唐中宗与百官将其送至平县(今西安市西)。苏颋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轮。川经断肠望，地与析支邻。奏曲风嘶马，衔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③]以及阎朝隐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还将贵公主，嫁与耨檀王。卤薄山河暗，琵琶道路长。回瞻父母国，日出在东方。”[④]这两首诗都是在金城公主出嫁之时的应制之诗，他们无不对和亲给予厚望，希望通过和亲可以与吐蕃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

与此同时，和亲也是少数民族加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手段之一，“北狄愿和亲，东京发使臣。马衔边地雪，衣染异方尘。”[⑤]（杜审言《送高郎中北使》）记录的便是送别高郎中时所做。当时东突厥默啜(默吸)可汗上表给武则天请求成为武则天之子，并主动提出将其女与唐朝和亲。于是于圣历元年(698年)六月，默啜(默吸)可汗嫁其女与淮阳王武延秀为妃，并且派遣使节将金银锦帛送至突厥。

总之，唐朝前期统治者实施的“怀柔远人”、“爱之如一”的民族思想体现出唐前期的平等、进步、开明的民族政策，而这样的民族政策无疑是有利于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1.2 胡气唐魄 金风玉露

初盛唐时期统治者实施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样的民族政策对于推动民族文化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盛唐诗歌“胡化”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胡人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唐人的开明与自信是分不开的。开明的政治

① [宋]刘昫.旧唐书·铁勒传（卷一九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345页
② [宋]刘昫.旧唐书·吐蕃传（卷一九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221页
③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800页
④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771页
⑤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735页

环境使异域文化能够传入中原，而唐人自信豁达的心态则是吸收这些外来文化的必要条件。傅永聚在《唐代民族概念新论》中认为：“新的民族观念改造着人们的心理，凝聚成一种超越单一民族狭隘偏见之上的强烈的大唐意识，改造着社会结构和民族结构，指导着开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①]

1.2.1 五方之民 皆养活之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统治者实行不分种族、平等如一的民族政策与其少数民族的血统有着密切关系。唐代皇室的祖先世代都是北朝官员，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民族大融合之际。唐高祖李渊之母，其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皆为鲜卑族，也就是说，唐朝建国初期的三代君主皆为鲜卑女子所生。这种骨子中的少数民族血统必然对中央政府对西域胡地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太宗时曾宣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②]将“抚九夷以仁”当作“君之体”。他对来朝觐见的回纥、铁勒首领道：“汝来归，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汝等。”[③]在民族观念上，唐高宗极力主张要实行民族平等，即“爱之如一”的政策，他否定了“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认为统治者若鱼肉百姓，那是禽兽所为。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唐太宗总是恪守内外无别，一视同仁的原则。在对待外族官员问题上，唐太宗则是真诚相待，委以重任，“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为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④]唐太宗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超越历代帝王，平定华夏大地的同时收服蛮夷，其主要原因便是“爱之如一”。由此，“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⑤]的大唐盛景的出现便不足为怪了。

在民族问题上，唐代统治者与周边各民族达成共识，唐平等待之，他们则以藩臣礼仪侍唐。“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

[①] 傅永聚.唐代民族概念新论[J].齐鲁学刊，1993（4）

[②] [唐]吴兢.贞观政要·礼乐(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32页

[③]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216页

[⑤] [宋]刘昫.旧唐书·魏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558页

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①]在这样的一个民族关系背景之下，唐王朝广泛的接受周边民族内附。他们多以援战、请降、被俘和避难的形式或被安置于中原、或安置于江淮之地，或安置于边地。其主要首领和家族则直接被安置在长安。除了部分在后期由于政策和形势等原因又返回旧地，大部分则长期留居中原。仅贞观年间大规模的安置便前后五次：

贞观三年，唐讨东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和郁射设、荫奈特勒等并帅所部来奔。[②]

贞观四年，二月，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俘男女十馀万、虏五万馀口而还。三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唐朝善后，东突厥首领多授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③]

贞观六年十一月，契苾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馀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④]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兵纵击，斩首三千馀级，捕虏五万馀人。[⑤]

贞观二十年，唐全力灭薛延陀，纵兵击，斩五千馀级，系老孺三万，遂灭其国。[⑥]

由此，初盛唐时期移民之盛可见一斑。除了安置移民之外，唐朝还大胆使用蕃将。在《新唐书·诸夷蕃将传》中，有突厥人、铁勒人、高丽人、百济人、昭武九姓诸国之人以及来自契丹、党项、沙陀之人。

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之下，边疆地区也一扫战争的阴霾，处处透露着和平与宁静。在边塞诗人岑参笔下，既有各族将领一起欢宴之场面“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⑦](岑参(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护寺卿》)，有叶河郡王与花门将军歌舞宴饮的生活“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⑧](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有边塞将领与单于赌乐塞马之情景：“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⑨]”(岑参《赵将军歌》)。玉门关外曾是烽火硝烟，但在常建笔下则是一派祥和安宁景象，“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

---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073页
② [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159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072—6078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099页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172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138页
⑦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83页
⑧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九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3页
⑨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106页

为日月光。”[①](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这一幅幅和平融洽的生活场面无疑应该归功与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怀柔政策。这些举措在化解民族争端的同时，促进民族间交流，为各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良好平台。同时，如此大规模的接收外来移民以及授官于蕃将，必将为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的广泛传入提供条件，这种开放的社会格局扩大了诗人的眼界，同时他们所带来的胡地文化也推动和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和繁荣。

1.2.2 自信开放 纳胡地精血

唐帝国建立以后，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也达到空前繁荣。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空前高涨。此时的唐人对于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启迪自身心智同时也开阔了眼界，激发了不尽的创造力。他们的诗歌超越空间限制、穿越历史时空、探究丰富的外部世界，以天外之笔书写荡气回肠的豪情壮志。沿用至今的唐人、唐装是唐人自信心和自豪感最为有力的证据。

对边塞山川大漠，唐人的心态是开放的。盛唐文人大都怀揣入仕经国的理想。“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②]（李益《塞下曲》），“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③]（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④]（李希仲《蓟北行二首》其二），戎马边塞、皮革裹尸，宁殒身固亦见名节。众多诗人满怀“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⑤]（王昌龄《变行路难》），“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⑥]（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的理想远赴边塞。当诗人从青山绿水之中来到狂杀冷风之中时，没有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⑦]（王维《山居秋暝》）的清幽，也没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⑧]（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的幽远；有的只是“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⑨]（岑参《首秋轮台》）的茫茫飞沙以及“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⑩]（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的寒冬飞雪。但这并没有成为诗人讨厌和逃避边塞生活的借口，反而每一段边塞生活都让诗人感到新奇和浪漫。他们纷纷将视角转向这新奇旎丽的边塞山川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四)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63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3224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306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16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20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98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276 页
[⑧]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四)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61 页
[⑨]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90 页
[⑩]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1 页

大漠，以雄壮的笔触勾勒和描绘边塞山川大地的雄伟壮丽。

对胡人任侠尚武之气，唐人心态是开放的。任侠之气，中国古代文人久已有之，但汉代以来，朝廷对游侠的大力打击，使得游侠转入民间，而唐代社会的开放程度，使得任侠之气重新成为文人的生活常态。众多诗人在诗歌中频频礼赞这种精神。如李白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①]王维《少年行》其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 纷纷射杀五单于。"[②]这些诗歌都表现出诗人对西北民族任侠精神的接受。他们追求少年游侠的那种自由精神，追求行侠仗义、拯物济世的人生理想。

对胡人风俗，唐人的心态是开放的。西域风土人情对唐人有着先天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葡萄美酒、胡姬酒肆、骏马健舞满足了唐人时代精神的需求。他们常栖身于"胡姬酒店"，夜听"管弦锵锵"，他们"新丰美酒斗十千"，他们跨骑紫骝马"挥鞭万里去"。李白在《对酒》中写道："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 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③]这其中有西域葡萄酒、有吴姬、有胡妆、有胡歌。由此可见胡地风俗习惯在唐代诗人中间的盛行。尤为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也钟情于胡地乐舞，《霓裳舞》便是由唐玄宗为杨贵妃所做。所谓上行下效，胡地的文化习俗很自然走进了盛唐诗人的生活之中。

陈寅恪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④]唐帝国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管辖和接触为唐人视野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性，但社会环境对内迁民族的接受及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开放也是胡汉文化融合的重要条件。

[①]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88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306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881页
[④]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344页

第二章 胡地乐舞与盛唐诗歌“胡化”现象

李唐王朝在中亚声名显赫，当时西域诸国处于唐王朝控制之下，唐之声威至今遗留在人们记忆之中。中原文人一向以风流儒雅著称，他们往来于宴饮酬唱之中，在歌舞诗词之中抒怀人生感悟。西域乐舞一经传入便受到唐代文人士大夫的亲睐。唐代统治者中，唐太宗不仅将西域音乐作为一种喜好，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怀柔的手段：“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①]“胡乐”的传入无疑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将从“胡乐”对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说明盛唐诗歌之“胡化”。

2.1 胡乐胡舞 盛行朝野

中原乐舞文化与周边各民族乐舞的渊源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延续千年。在隋代，欣赏西域音乐的社会风气尤其盛行，而这种风气更是延续至唐代。在唐代，音乐被西域诸国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在唐高祖亲自主持的宴会上，可以有突厥可汗起舞、南越酋长咏诗，出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的局面。”[②]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下，大量胡地乐舞传入中原内地。对于胡地乐舞在中原风行之盛，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管窥一二。

对于胡地音乐，从唐代的宫廷乐部分类，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胡乐在唐代宫廷之盛行。据《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序》记载:“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於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

① [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13页
② 余恕诚.唐诗风貌[M].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24页

始於武德、贞观，盛於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肃、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乱，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见矣。”[①]

唐之音乐胡化之盛况，胡振亨在《唐音癸签•乐通》中记载道：“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及宴飨，作之门外，美广德之所及也自南北分裂，音乐雅俗不分，西北胡戎之音，揉乱中华正声。降至周、隋，管弦杂曲,多用西凉；鼓舞曲多用龟兹；燕享九部之乐，夷乐至居其七。唐兴，仍而不改。开元末，甚而升胡部于堂上，使之坐奏，非惟不能厘正，更扬其波。于是昧禁之音，益流传乐府,浸渍人心，不可复洗涤矣。”[②]由此可见，由隋入唐，音乐之胡化已达浸渍人心的盛况。

与音乐的风行一样，唐代舞蹈的流传与统治阶级的提倡甚至亲身实践有关。在唐代，舞蹈主要分为软舞和健舞。据《教坊记》载：“《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③]又据《乐府杂录》：“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④]这些舞蹈中，有文献可证与“胡”有渊源者有《胡旋》、《柘枝》、《屈柘》、《大渭州》、《拂林》、《阿辽》、《半社渠》、《借席》、《达摩支》。[⑤]由此可见在盛唐舞蹈中，与“胡”有关的舞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统治者对胡地乐舞的喜好为其在盛唐社会的流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欣赏外来音乐的习惯以及当时的社会时尚中表现出来的对外来音乐的热情，从宫廷传到了贵族之中，接着又漫延到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之中。”[⑥]从文化形态上说，乐舞文化是与唐诗关系最为密切，诗乐舞三者本是一体的。音乐舞蹈的“胡化”必将推动诗歌创作的“胡化”。

[①]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107页
[②]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63页
[③]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页
[④] 段安节.乐府杂录•碧鸡漫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8页
[⑤] 王松涛. 从胡舞的流行看盛唐气象的多元性与延续性[J]，中华文化论坛，2008,(1)
[⑥]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11页

2.2 诗歌乐舞 如胶似漆

2.2.1 盛唐诗歌中的胡乐

盛唐时期，玄宗酷爱音乐。天宝十三年，玄宗曾以太常寺刻石的方式更改西域乐曲名，其中便包括《婆罗门曲》，玄宗将其改名为《霓裳羽衣舞曲》。《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①]由此观来，此曲并非玄宗所创，而是由西域传来。此外唐玄宗参与改编的具有浓厚西域“胡音”的宫廷乐舞还有《小破阵乐》、《龙池乐》等。这些胡地传进来的乐曲倍受王公贵族喜爱，在欣赏这些乐舞表演同时，诗人的创作心态也受到其中胡地气息的影响。

诗人是社会精英分子的代表，他们对于胡乐的喜爱主要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由此，在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便出现了对“胡乐”的描写。在这些诗歌中，有的是对胡乐强劲感染力的描绘，如杜甫《夜闻觱篥》：“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叹悲壮。”[②]（杜甫《夜闻觱篥》），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有的则是对诗人欣赏音乐时悠然之态的描写，如李白《上云乐》其二：“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④]（李白《上云乐》）；有的则是对歌者的描写，如王维《听宫莺》：“春树绕宫墙，宫莺啭曙光”[⑤]；有的则道出了外来音乐流行于盛唐民间的情况，如李白《司马将军歌》：“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⑥]。

李白在宜春苑侍奉玄宗时的一首应制诗《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也是一首诗人“愿入箫韶杂凤笙”的乐府诗，诗人希冀此作能被采入宫廷乐府成为宜春苑梨园子弟演奏和歌舞的保留节目。《春莺啭》的作者白明达是来自西域的著名作曲家，该曲具有浓郁的西域乐舞特点，此点向达先生已经证实。李白此诗显然是对旧曲《春莺啭》的传承变异。“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石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⑦]表明，诗人侍从玄宗驾临宜春苑，睹宫廷春景春莺，聆内人歌舞而翻作《新莺百啭歌》，

[①] [宋]王溥.唐会要•雅乐下（卷三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44一50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373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105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87页
[⑤]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80页
[⑥]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94页
[⑦]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16页

以期被采入梨园重新按乐表演。

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则是将音乐美透过诗歌完美的呈现出来：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①]

本诗共十八句，前六句介绍觱篥的出处以及强劲的感染力，中间十句介绍觱篥歌声音和曲调转换的奇妙，忽如寒风吹树，有落叶枯桑，有常绿老柏，忽如九凤鸣啾，各发雏音，将声音之变幻细致的表现出来，如龙吟虎啸，又如百泉相会，此四句正面描绘出觱篥声音变化之精妙，接下来在描写曲调变化时，诗人先以《渔阳掺》鼓相比，后以《杨柳枝》曲来比，从沙尘漫天中忽又来到百花齐放的上林苑，在对比中显现出艺人高超的吹奏技巧。最后两句诗人回归现实，发出浮生若梦的感叹，“美酒一杯声一曲”则与上文“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相呼应，道出自己与“世人”的不同。整首诗可谓巧妙的呈现了觱篥歌的精妙绝伦，这种融诗于乐的现象在文人中颇为常见。著名诗人王维精通音律，曾任大乐署丞一职，其创作的《凉州曲》、《阳关曲》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2.2.2 盛唐诗歌中的胡舞

在西域舞蹈中，健舞以其矫健多姿和气势雄伟而广受唐人喜爱。其中盛唐时期反映在诗人诗歌创作中的舞蹈主要有《胡旋舞》跟《剑器舞》

关于胡旋舞的起源，在《旧唐书》载曰：“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②]这与在《通典》中的记录相印证：“康国乐，工人皁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衿。舞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二。”[③]

胡旋舞在初盛唐时期是极为盛行的一种舞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九姓胡频献胡旋女：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354页
[②] [宋]刘昫. 旧唐书（卷二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071页
[③] [唐]杜佑. 通典（卷一四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724页

开元初，康国“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磁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①]

开元时，米国“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②]

二是胡旋舞在王公大臣中颇为流行，史载安禄山更是胡旋舞的高手，《旧唐书·安禄山传》：“禄山晚年益肥胖，腹垂过膝……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③]

专门描述胡旋舞的诗歌有岑参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世人学舞只是舞，恣态岂能得如此。[④]

通过反复咏叹，铺陈夸张的手法，突出了诗人对舞者饱满的赞誉之情。诗歌开头六句便反复咏叹，指出胡旋舞本是胡地传入，观看过的人无不惊叹舞蹈的精彩绝伦。接下来诗人从舞者曼妙的身姿、飞旋的裙角、精彩的伴奏来咏叹舞蹈的美妙。一曲听罢，诗人发出“采莲落梅”皆为聒噪之音，而“世人学舞”不能达到如此神奇境界的感叹。在诗歌中。处处展现出诗人对西域风情的喜爱。首先感叹歌舞之新奇，充满着对西域舞蹈的猎奇探究心理，接下来舞者苗条丰满的身材以及娇媚的容颜成为诗人感叹对象，回旋的裙子和转动的袖子，这些都无不极具西域文化特征，就连那伴奏的琵琶横笛演奏出来的也是《出塞》、《入塞》之曲，让人犹如见到塞外寒风飕飕、风折白草的景象。整首诗虽为写西域胡旋舞，实则表达出来的是对西域文化浓厚的好奇和喜爱之情。

此外，杜甫诗歌中也记录着一种西域舞蹈表演，名曰《剑器浑脱》，其诗曰：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况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

[①]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一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4 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一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7 页
[③] [宋]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68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7 页

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①]（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诗人在自序中讲到自己曾经在开元三年，在郾城观看过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间似反掌”写出了世事变迁，反掌间已经五十余年，但当年公孙大娘刚劲的舞姿依旧令诗人念念不忘，以至于一眼便认出此为公孙大娘弟子。舞者刚健顿挫的舞姿在杜诗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舞者相貌清丽、手持双剑，动作矫健多姿、英武激昂，时而雷腾龙月、时而静似波光，舞蹈的动静相间、乍动乍息、变幻莫测让观者目瞪口呆。

无论是对《胡旋舞》的描写，还是对《剑器浑脱》的描述，诗歌表现出一种矫健舞动的美感，这与南朝舞蹈有着巨大的区别。胡舞的热情奔放和矫健明快融入到唐人昂扬向上的精神当中，成为“盛唐气象”蓬勃朝气、青春旋律的一部分。

2.2.3 盛唐诗歌中的乐器

在论及胡乐和胡舞之时，乐器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纵观诗人的诗歌创作，出现频率较高的异域乐器主要有琵琶、羌笛、胡笳等。跟中原乐器相比，胡地乐器以其独特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赢得了整个社会的青睐。下面将以琵琶、胡笳系列为例说明乐器文化对盛唐诗歌创作内容的丰富。

琵琶

此处所指琵琶指源于西域之琵琶。西域之琵琶有四弦跟五弦之分。四弦琵琶曲项，梨形音箱，据林谦三考证，曲项琵琶的发祥地是伊朗，与近世阿拉伯的乌特同源。[②]；五弦琵琶为直项，梨形音箱，《新唐书·礼乐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琵琶。”[③]在大唐帝国，不论是塞外胡人还是宫廷乐师，抑或青楼佳丽，琵琶是其抒发情感的重要媒介。琵琶盛行于帝国的各个角落。天山：“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④]（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蓟北：“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⑤]（李欣《古塞下曲》）；酒泉：“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⑥]（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

[①]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356页
[②]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M].上海：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第257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页
[④]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0页
[⑤]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338页
[⑥]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5页

琵琶”。[①](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辽东：“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②](李欣《古意》)。关山：“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③](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送别宴会之上：“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④]（李白《夜别张五》）

胡笳系列

段安节《乐府杂录》曰：“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⑤]《太平御览》：“觱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音，五音咸备。”[⑥]羌笛，源于羌族的吹奏乐器。汉代即已流行，竖吹，多为双管。“笛者，羌乐也，古有落梅花曲。”[⑦](宋)陈旸《乐书》：“芦管之制，胡人截芦为之，大概与觱篥相类，出于北国者也》”[⑧]

由此可见，胡笳、觱篥、羌笛、芦管这几种乐器从材质和形制方面有很大的共同点。反映在诗歌在表情达意上，胡笳、觱篥、羌笛、芦管这四种乐器多为悲情低落之音。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⑨](李白《清溪半夜闻笛》)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⑩](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11](孟浩然《凉州词》其二)

在这些诗歌中，不论是豪放派诗人，还是山水诗人，抑或是身在疆场的边塞诗人，他们无不将这些胡地乐器与玉门关、关山、折柳等这些思乡惆怅之物相联系。这些乐器因其独特的感染力和表现力逐渐染上了一种特定的人文文化意象。因此，这些乐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器物，而是被赋予了寄托和象征意义。胡地乐器意象常常被诗人用来抒发悲凉的心情或者渲染行军及边战的艰辛。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和流布过程中，这些被赋予的寄托和象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5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355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433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81页
[⑤] 段安节. 乐府杂录[M].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34页
[⑥] [宋]李昉，李穆等. 太平御览（卷五八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631页
[⑦] 段安节. 乐府杂录[M].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34页
[⑧] [宋]陈旸. 乐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1页
[⑨]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856页
[⑩]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243页
[11]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68页

征意义便逐渐被强化和固定下来，成为诗人表情达意的重要依托媒介。

此类音乐意象的运用还有诸如张说《幽州夜饮》：“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①]，王昌龄《胡笳曲》：“自有金笳引，能沾出塞衣”[②]，以胡笳悲切之声调写出了诗人怀念故土、思念亲人之情。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③]，则描述的是塞外将士被琵琶声勾起怀乡之情之后眼睁睁的盯着月亮，夜不成眠。“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④]（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以胡笳之音将戍边士兵的愁苦、思乡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⑤]（高适《部落曲》）、“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⑥]（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等等，俱写胡笳，其中“泪如雨”、“愁杀”、“声最悲”、“断人肠”等词语点出了胡笳的悲凉之韵，亦令读者内心凄恻不已。这些诗歌无不通过胡笳独特的感染力，道出了思妇的愁苦，游子的悲愁、征人的思乡以及三军的泪水，营造出一种悲凉的音乐境界，从而增强了边塞诗歌艺术的深广度。

2.3 诗乐相伴 相依相促

在艺术殿堂中始终存在着一对孪生兄弟，这便是诗歌与音乐。唐朝诗歌繁盛，音乐发达，除了盛唐时期繁荣的经济与开明的政治因素，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和相互促进更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由于统治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量的异域诗歌形式传入内地，涌现出风格迥异的音乐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同时，许多诗人精通音律，于是出现了乐人采诗入乐，诗人以诗配乐的场面。在这种情形之下，诗歌的韵律节奏在无形当中受到了外来音乐的影响。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各种珍宝异物汇聚中原，各种潮流层出不断，音乐入诗便是当时最为时尚的潮流之一。乐伎需歌传名，诗人同样需要以诗出名。钱穆曾经说：“唐代官私妓女均盛，凡公私宴集，衡有歌妓娱宾，所唱往往为诗篇，宾主即席吟诗，可能即付她们歌唱，被之管弦。歌妓唱歌，犹如今日大众传播之电台、电视台，以此播之四方，这样诗人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八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947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38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42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105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25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3 页

易出名，人亦群趋为诗。”[①]诗人需以诗传名，唐代音乐的兴盛便成为诗人传名的重要途径之一。梁启超曾说：“音乐发达的时代，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②]高度繁荣的音乐要求拥有充足数量可以入乐的歌辞，同时诗歌入乐后又便于传颂，由此便出现了诗歌与乐工互利双赢的局面。诗人参加各种乐舞活动之时，诗人直接为各种乐曲创作歌词，同时乐舞活动也为诗人提供众多的创作灵感。旺盛的艺术创作力，在创作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歌辞的同时，又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歌辞，这又会反过来促进了音乐的创作。音乐与诗歌便在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不断的进步发展，共同创造了“诗”跟“乐”的繁荣。

此外，在李唐统治者中，众多君主对音乐情有独钟，唐玄宗尤甚之。他们酷爱外来曲调的同时，也喜欢自己谱写新的曲调。李白应唐玄宗召进《清平调》新词的故事在《松窗杂录》等文献中均有记载：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③]

此外，唐人把所写歌辞可歌作为对朋友诗歌的最高评价。唐代宗皇帝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说：“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④]由此可见，代宗皇帝对王维所写之诗可以与乐府相唱和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唐代，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主要有以乐配诗和以诗配乐两种形式。以乐配诗是指乐工通过寻找合适的诗作与现有的音乐曲调相结合，然后进行表演吟唱。乐工在选诗配乐之时对诗歌有着较高的要求，既要求平仄声韵和句数句式大致相符，也要求节奏、旋律以及结构基本相符。在当时，任何好的诗作都会受到歌手的追捧，他们或争相求之、或以重金相索。有的时候，乐工还需依据歌曲曲调对原诗进行删减或者续写，以求诗乐浑然相合。同时诗人也会以自己的诗歌作品能被乐工配乐传唱而感到光荣。以诗配乐则是诗人为已有的音乐曲调重新写诗词与之相配。诗人在创作诗歌和音乐的时候，或为酬唱、或为言志、或

[①] 严耕望. 钱宾四先生与我[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第 111 页
[②] 梁启超.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第 8 页
[③] 李濬. 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 213 页
[④] 董浩.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 510 页

为应制。李白《清平调》三首便是诗人按照《清平调》应制所写的新词。

在唐代，乐曲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诗人为赢得诗名，主动为乐伎配乐，“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在音乐的推动之下，乐伎与诗人相互携手，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新的灵魂。

第三章 胡地地理人文景观与盛唐诗歌“胡化”现象

对于初盛唐社会而言，这一时期是征服和移民的时期。对外战争虽然消耗了国力，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借助西通之路，一方面众多中原文人走向塞外胡地，诸如王之涣、王昌龄、李白曾赴胡地漫游；高适、岑参、李益等诗人曾在幕府为官。另一方面，大量胡人、胡俗通过此路传入中原。“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待蕃将，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①]由此可见，西域通道的打通对中原文人接触和了解胡地自然风光和胡人各种习俗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西域胡地缤纷多彩的游牧生活满足了唐人猎奇好异之心，这些东西在走进诗人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诗人的创作。

3.1 山川奇丽 巡游踏访

大漠、瀚海、草原、飞雪……是盛唐诗人呈现给我们的一种美。任凭光阴荏苒，却依旧荡人心魄，在“天苍苍，野茫茫”的高天阔地之间，诗人以高昂的激情抒发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在唐王朝三百年的历史中，与周边少数民族边塞战争频繁。尤其是盛唐一代，以其强盛之国力，加以融合北方民族尚武之精神，游侠尚武之气蔚然成风，外加唐王朝常以军功取士，马上功名成为众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追求。《资治通鉴》这样评价道：“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②]这在开元天宝年间不乏其例，如：程千里、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等。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一批诗人被推向了烽火狼烟、江山塞漠的前沿，边塞成为众多文人施展救国理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场所，由此催生了盛唐边塞诗歌的繁荣。

在众多边塞诗人的笔下，我们感受到了“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③]这样的边塞奇丽景象。如李白：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42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888页

[③]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32页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嶷。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①]

《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②]

高适：

《燕歌行》："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③]

《送裴别将之安西》："地出流沙外，天长甲子西。"[④]

王昌龄：

《从军行》其一："向夕临大荒，朔风轸归虑。平沙万里余，飞鸟宿何处。虏骑猎长原，翩翩傍河去。"[⑤]

《从军行》其六："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⑥]

王维：

《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⑦]

《送平澹然判官》："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⑧]

杜甫：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⑨]

《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⑩]

……

这些诗中不仅有对西域风光的描绘，更充斥着大量的西域地理词汇，如：葱岭、盐泽、月窟、碎叶、青海湾、热海、铁关、楼兰、轮台、大宛、流沙、火山、月支、阳关、疏勒、铁门、条支、昆仑、瀚海、交河、天山、西海、陇山、玉门关、安西、葱河、北庭、银山、

---

①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七)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809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89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217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四)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230页
⑤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421页
⑥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443页
⑦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71页
⑧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70页
⑨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272页
⑩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349页

蒲海等。

盛唐诗人中，亲历边塞者尤以岑参为代表，他两赴安西，第一次是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充安西节度判官，赴安西，天宝九年，岑参曾出使武威，然后返回。第二次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三月，岑参摄监察御史，为大理评事，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又富有纪实性的诗歌。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在岑参笔下，西域风光句句见“奇”，充满着浪漫与豪情。边塞风物者尤以风、雪、沙为代表，在岑参笔下则是奇幻荡漾，故本节以岑参诗歌中对边塞风、雪、沙的描绘来说明胡地地理文化景观给盛唐诗歌创作带来的体裁内容上的丰富。

3.1.1 疾劲狂风

在岑参笔下的边塞之风有的是昼夜不休，持续不断：

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①]（《北庭作》）

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②]（《寄宇文判官》）

更有甚者则是终年不止，热浪滚滚，虽寒冬腊月却依旧让人汗流不止：

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③]（《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

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④]（《经火山》）。

大风卷起的飞沙走石，则有要人性命之势：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⑤]（《银山碛西馆》）；

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⑥]（《首秋轮台》）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⑦]（《赵将军歌》）

综上分析可见，边塞之风不仅仅昼夜不休，而且四季不止，最为不寒而栗的是如刀似剑般的狂劲。这些在中原是体验不到的。

3.1.2 广袤沙碛

从中原到西域边塞，对诗人的另外一个震撼便是广袤的沙碛。西域的地貌特征主要是

①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90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64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24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46页
⑤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6页
⑥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90页
⑦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106页

高山和沙漠。天山之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之北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些广袤的地理特征无疑是诗人见所未见，出于内心的震撼，这些地理特征便理所当然的进入诗人视野，成为诗人描写和感叹对象。

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①]（《北庭贻宗学士道别》）

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②]（《玉门关盖将军歌》）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③]（《银山碛西馆》）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④]（《碛中作》）

3.1.3 酷寒冰雪

岑参边塞诗中描写冰雪的诗歌，总让人感到寒气逼人。其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首：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⑤]（《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晻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⑥]（《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这两首诗描写的情景是风急雪大，一夜之间天地间唯有皑皑白雪，目光所及，雪片飞舞，纵有狐裘保暖，但总感觉不抵风雪严寒，“都护宝刀冻欲断”，“将军角弓不得控”，战马寒气腾腾，但依旧满覆白雪，甚至于辕门的红旗已冻成雕塑，凛冽寒风也无法吹动。

作为一名诗人，岑参满怀着一颗猎奇之心走向边塞。而边塞独特的地理风貌则透过诗人诗性灵光的点染一一呈现出来。在那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夏蛙秋蝉，也少了季节的变化，但正是这山川地理的陌生性及季节的反差激起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为边塞诗歌繁荣

①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33页
②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8页
③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6页
④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106页
⑤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0页
⑥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1页

提供了丰富养料。在岑参笔下众多边塞诗中，诗人所反映出来的豁达心境与恶劣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帐篷之外“风掣红旗冻不翻”，帐篷之内则是“中军置酒饮归客”，雪中与友人离别之际，折上一枝青松作为离别礼物。在这些诗歌中盛唐诗人豁达的心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3.2 物产独特 爱不释手

胡地民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向达先生很全面地概括道：“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①]

由此可以看出异域文化习俗在盛唐时期流行的主要情况：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各种各样的异域文化习俗都受到认可和欢迎；不管是生活还是娱乐，饮食还是服饰，都受异域文化影响。诗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和诗人内心情感的主要工具，其创作内容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下面将从葡萄（酒）、胡姬、胡服、胡食、胡俗四个方面来描述和阐释民族交融影响下异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3.2.1 葡萄（酒）

唐人对饮酒的喜爱可谓超越了历代所有人。素有诗中酒仙的李白高唱“会须一饮三百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②]。杜甫在《饮中八仙歌》更是将李白饮酒之态写得传奇豪放：“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③]唐人饮酒之豪气可见一斑。在唐人所饮的这些酒中不乏胡地美酒，如诗中提到的“金叵罗”、“夜光杯”都是胡人饮酒之具。在唐代还出现了“酒胡”这一劝人饮酒之具。这种“酒胡”实际上是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饮酒之时，若“酒胡”倒向某位宾客，则他就必须将杯中饮干。年轻诗人常以这种木偶人取乐。

西域酒在唐代可谓广为流行。“李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蒲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大约亦出于波斯。俱为时人所称美。”[④]魏征曾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 42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15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59 页
[④]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 50 页

受唐太宗之命向西域胡人学习酿造美酒的办法，酒成之后将美酒用金瓮储存十年之后，其味道已非同寻常。于是唐太宗写诗感叹说：“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1]（李世民《赐魏征诗》）这与《册府元龟》的记载相吻合：“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2]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自汉至唐，吾国产名酒之地多是中亚胡族聚居区域。”[3]当时的西域胡酒是相当宝贵和珍贵的。

在盛唐文人的诗歌中也不乏描写胡酒的诗篇，如：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4]（李白《对酒》）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5]（王翰《凉州词》其一）

伴随西域胡酒在中原盛行，西域胡酒在唐诗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或表达被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唐诗的艺术表现空间。

在盛唐诗歌中，葡萄酒常被这样描绘：

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6](鲍防《杂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7](杜甫《洗兵马》)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8](李颀《古从军行》)

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匈奴系颈数应尽，明年应入蒲萄宫。[9](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

苜蓿随天马，蒲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10](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

在这些作品之中，鲍防之诗意在讽喻帝王；杜甫诗记录安史之乱中唐代借助胡兵收复长安事实；李颀之诗关注战争苦难；李白、王维之诗写的斗志昂扬。但诗歌内容中都涉及

---

[1]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 页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 50 页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 376 页
[4]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881 页
[5]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05 页
[6]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百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3485 页
[7]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78 页
[8]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348 页
[9]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99 页
[10]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271 页

到“葡萄”这一概念。葡萄，在我国史籍中又写作“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但不论其写成什么，“葡萄（酒）是中原王朝征服西域的象征符号。”[①]可见，葡萄这一概念在唐代文人心目的中的重要性——它已成为汉唐王朝征服四夷，万国朝拜的象征。

此外，“琥珀”原为一种西域宝石，李白《客中行》中曾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②]之句，以此来形容透明的红黄色的酒。同样在张说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北堂珍重琥珀酒，庭前列肆茱萸席”[③]。（张说《城南亭作》）韦应物在《咏琥珀》中说明了琥珀的形成过程：“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④]。（韦应物《咏琥珀》）在诗歌描述中，李白开创了以琥珀描述美酒颜色的先河，李贺则将这一比喻更进一步，他用转喻的方式，用“琥珀”喻“酒”，在《将进酒》中，他则以“琥珀”来直接代指“酒”，以此来表现强烈的明暗度：“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⑤]，白居易在《荔枝楼对酒》中也有类似的用：“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⑥]

3.2.2 胡姬

唐代社会自贞观到天宝年间，外族降附者甚众。不只在长安这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扬州和广州这些地方也有大量胡人涌入。伴随商贸业日益繁荣，大批胡商涌入中原，他们将胡姬乐舞表演跟酒肆经营相结合，凭借独特的异域风情和甘甜醇美的异域美酒吸引众多文人士子在此流连忘返。由此，胡姬便进入诗人的视线范围之内。

首先，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热情开放的胡姬侍女是大受欢迎。

在文化因素影响之下，胡人女性相对中原女性较为开放。他们出入厅堂招待客人。他们游离于封建礼制之外，在与文人士子的交流之中不存在任何功利性。胡姬以其美貌的外表和别具一格的装束赢得了文人雅士的喜爱。“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⑦]（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三首》其二）如此美貌胡姬引得五陵少年流连忘返，“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⑧]（李白《少年行》其二）

[①] 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第 242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842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940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985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4434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4925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85 页
[⑧]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08 页

其次，别具一格的异域风情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

胡姬酒肆之中不光有西域各种美酒，更有西域美食，西域歌舞。一间酒肆俨然浓缩了整个西域别样的异域风情。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①]（贺朝《赠酒店胡姬》）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②]（李白《醉后赠王历阳》）

在胡姬酒肆之中，诗人饮的是胡地美酒，吃的是胡地美食，听的胡地歌谣，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诗人便徜徉在胡地文化包围中。由此，胡姬形象成为文人墨客对西域文化意象的一张文化脸谱。

胡姬那曼妙舞姿、蓬勃生机与动感活力与唐代文人坦荡不羁、豪迈任侠的精神世界是相符的。向达先生曾说："是当时贾胡，固有以卖酒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能饮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咏，留连叹赏……"可见文人们常常在胡姬酒肆中驻足流连。

试比较李白的两首诗：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③]（李白《少年行》其二）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④]（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

前一首中写的是诗人意气风发、潇洒的饮于酒肆中。而后一首描述的则是惆怅迷茫的诗人。伴随酒肆胡姬与文人生活的越来越紧密，胡姬形象已成为诗歌意象，意在引出诗人情思。除了李白的这首诗作于青门，另有岑参的两首诗也作于青门：

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灞头落花没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黄鹂翅湿飞转低，关东尺书醉懒题。须臾望君不可见，扬鞭飞鞚疾如箭。借问使乎何时来，莫作东飞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一十七)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181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一)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58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08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97 页

伯劳西飞燕。[①]（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

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②]（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胡姬已经是诗人内心的一个心灵驿站，成为朋友送别之所。通过对胡姬形象的描摹，文人墨客们完成了自己对遥远西域的各种想象，透过这些寓居长安的胡姬形象，诗人可以完成自己内心的一种文化穿越。满足了他们受制于地域疆界藩篱的远足渴望，她们基于人种差异以及舞蹈技艺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迥异于中原妇女的他性（the other）特征，无疑建构起一幅大唐文化之外的文化谱系。[③]

3.2.3 胡服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居住的自然条件。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在长期农耕文明影响下，形成的是一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相对保守和稳重的性格，其性格可以定性为植物性格；相对而言，边塞各民族逐水草而居，其居住特点是移动性比较强，因此这些民族在性格上喜欢冲突和冒险。两种性格的差异性造成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各民族地区在服饰上的巨大差异。反而言之，这种差异为服饰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广阔空间。

上文提到，在初盛唐时期，由于开明的民族政策，大量少数民族居民涌入长安，其中不乏部落首领和家族长老，这些外来民族服饰的华丽不仅赢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社会各阶层更是对其趋之若鹜。在当时，“穿胡服”和“着胡帽”成为一种潮流。唐人张守节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胡服，今时服也”，由此可以推见少数民族服装在盛唐社会的流行之程度。姚汝能亦谓：“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④]这种对胡服的热捧在当时的两京地区尤为流行。

诗歌中关于服饰的描述主要有：“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⑤]，“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⑥]，“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⑦]“粉胸半掩疑暗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2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60 页
[③] 王敏. 胡姬形象与西域文化的传播[J]. 新闻界, 2012, 第 9 期
[④] [唐]姚汝能. 曾贻芬点校. 安禄山事迹(卷下) [M]，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 107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106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106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3003 页

雪”、“绮罗丝缕见肌肤”则是对妇女着装裸露的描述。

3.2.4 胡食

胡食在汉魏便已传入中原，至唐朝，胡食更是深受欢迎。开元时期，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通鉴·玄宗纪》曾记载安史之乱时，玄宗仓促向西逃跑，在到达咸阳集贤宫后没有充饥之物，杨国忠便市胡饼以献。而杨国忠本人也爱吃胡饼：“《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盖胡饼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①]除了胡饼以外，各民族还有以肉酪为主，岑参在诗中写道：“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②]（《玉门关盖将军歌》）的“野驼酥”便是其中一种。此外，岑参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所提：“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③]的“烹野驼”与杜甫诗中“劝客驼蹄羹”、“紫驼之峰出翠釜”同样也是西域胡地的一种名贵胡食。

3.2.5 胡地娱乐活动

伴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原节日也开始出现“胡风”踪迹。王维诗云：“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④]（《寒食城东即事》），描述的便是寒食节中原风俗，此外还有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⑤]，杜甫《清明二首》：“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⑥]等。可见不论是寒食节还是稍后的清明节，蹴鞠跟秋千已经成为唐人重要的娱乐活动。关于秋千，《记纂渊海》载：“古今艺术图：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⑦]而关于蹴鞠的考证，向达跟爱德华·谢弗均认为蹴鞠是由波斯即现在伊朗经西域传至吐蕃，然后盛行于中原的。在盛唐时期，蹴鞠广受欢迎，上至诸帝众王、下至民间少年，竞相研习。《封氏闻见》中记录了玄宗在与吐蕃蹴鞠赛中获胜的场景。关于玄宗打球的诗歌有蔡孚的《打球篇》：

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銮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由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鬃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騮。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

[①] [宋] 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4页
[②]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8页
[③]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5页
[④]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259页
[⑤]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9页
[⑥] [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577页
[⑦] [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杂戏部(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页

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①]

诗中不仅描绘了打球者熟练挥动球杆的精彩，同时也形象描绘出比赛的激烈。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唐人打球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唐人精神的昂扬向上。

除了蹴鞠、荡秋千之外，一直延续至今的上元节观灯习俗也源自西域胡地。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②]以及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③]、“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④]据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中《上元》关于洛阳“灯楼”的记载：“祭户遗风，观灯故事，火树灯楼。帝女巢成而得仙，僧徒云集而观雨。”[⑤]以及《朝野佥载》记载的长安灯轮：“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⑥]苏味道诗中所提“火树”与张说诗中“火树”、“西域灯轮”与《岁华纪丽》和《朝野佥载》所记应同为上元灯树，且通过张诗我们可知此物来自西域。《唐会要·吐火罗国》有载:“麟德二年,(乌湿波)遣其弟祖绝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⑦]则证明了这一推测的正确性。

对于唐代外来物品，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考证和说明。伴随文化的交融，外来物品必然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如此多的外来物品对盛唐诗歌究竟产生了多大、多久远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本篇仅以上述几种外来物品在唐诗中的反映为例，同时期待有学者对其作出系统之研究。

---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七十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816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六十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752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八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982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八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982页
⑤ [唐]韩鄂. 岁华纪丽· 上元(卷一) [M]. 第27页
⑥ [唐] 张鷟. 朝野佥载(卷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28页
⑦ [宋]王溥. 唐会要(卷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35页

第四章 胡人精神风貌与盛唐诗歌“胡化”现象

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在后人心目中，盛唐一直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在此期间，李唐王朝以其灿烂的文化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盛唐时期是中国梦的信心源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盛唐时期，人们普遍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这份自豪感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体现在盛唐诗人内心的那份英雄主义的情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①]（杨炯《从军行》）写出了初盛唐诗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抱负，“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②]（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则写出了诗人豪迈的英雄气概。盛唐时期，在内，由于国力上的绝对强盛，诗人内心普遍以大汉天朝自比，同时受求取功名、入仕济世思想的激励；在外，唐帝国与周边各民族关系密切，胡人尚武之精神风貌的传入，英雄、豪侠之风蔚然成风。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盛唐诗歌创作普遍表现出一种昂扬的英雄主义风格。

4.1 游侠少年 仗剑出行

盛唐时期，唐人心目中普遍具有一种游侠情结，他们渴望疆场建功立业：“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③]（岑参 《银山碛西馆》）、“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④]（杜甫 《后出塞五首》其一）；国家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昨夜星官动紫微，今年天子用武威。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⑤]（万齐融《仗剑行》）；辞别妻儿：“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⑥]（王昌龄《变行路难》）；一心只为破敌杀贼：“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⑦]。（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这种透露着英雄主义的诗歌创作风格在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中存有大量的诗篇。本为山水田园诗人的王维，其诗大都恬淡平和，但在他的诗歌中也透露着英雄主义的豪情。且看王维的《燕支行》：

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五十)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611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43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6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93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一十七)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182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420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四)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00 页

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雠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百白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①]

这首诗描绘了一位深谋远虑、深谙兵法的将军奉命奔赴前线，带领士兵们奋勇杀敌的场面。整首诗透露着诗人心中激昂澎湃的英雄情结。又有《少年行四首》：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其一）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二）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其三）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其四）[②]

则描绘了一名游侠少年满怀爱国热情和不畏生死的豪侠形象。人道老骥伏枥，即使年时以高，但是当看到烽火狼烟，内心依旧慷慨激昂：“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③]（王维《老将行》）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无疑是唐代诗人中的游侠。在他身上有对传统文化的叛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有对平等的追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④]。在李白的诗歌彰显着作为一个游侠少年的豪侠义气，他赞扬“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⑤]，希望自己“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⑥]，能够“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⑦]羡慕游侠儿的潇洒光彩：“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⑧]

游侠尚武之气的形成与盛唐时期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游侠之风自古有之，但唐人将游侠之风与赴边之气相结合，同时边塞独特的风俗更激化了他们心中的游侠情怀，在盛唐文人心中的这种尚武之气已经不再是“以武犯禁”的破坏社会治的安逞凶好斗之气，而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257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306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257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59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83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820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820 页
⑧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一)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70 页

是一种民族责任的担当。在唐以前，社会普遍认为好男不当兵。自汉代开始，中原文人一方面受“独尊儒术”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游侠”风气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便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南朝文人素以“文弱书生”自称，在他们看来，文人乘骑高头大马是有辱斯文的事情。朝堂之上，“文左武右”也已成定型。然自五胡乱华到隋唐民族融合，胡人走马游猎、崇武尚侠的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中原文人的心境。隋唐统治者皆有胡人血统，杀伐抢掠是这些西北少数名族自幼形成的民族心理，在这些异质文化影响之下，唐代精英分子已经不再满足于谦谦君子形象，他们仰慕“仗剑去国”的英雄豪侠之气。他们豪饮纵搏，超脱功名，他们追求自由、激情。这种精神表现在盛唐文人诗人创作中，便呈现出“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①]的盛唐之气。此外，游侠风气的盛行还与唐王朝所采用的用人制度息息相关。一方面，在科举取士制度下，文人要经历“行卷”与“守选”之后才能真正踏上仕途，而“守选”少则三年，多则数十年；另一方面，唐王朝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开边拓土的战争中屡屡获胜，文臣武将因此加官进爵。在这两方面的刺激之下，众多文人便选择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以此来实现自已求取功名之梦。这无疑为游侠尚武之气的盛行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4.2 纵马驰骋 立业取功

文人游侠尚武之气的形成与唐人功名观有着内在联系。盛唐诗人满怀青春朝气，积极入仕。在当时，入仕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科举取士，二是军功入仕，三是隐逸致仕。沙场建功名是盛唐诗人慷慨激昂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些诗篇中虽有悲怆的洒脱，但更多的是豪放的激情。

4.2.1 投身沙场 方显本色

胡地的秋风凌烈、金戈铁马激起了豪迈慷慨的侠士情怀。玉门关外、函谷关上的毫秒苍凉孕育了诗人强悍英纵、神武刚毅的精神。众多知识分子为实现“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从不讳言对官场的渴望，王维曾坦言：“辞去和所欲，穷边徇微禄”继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后，盛唐诗人高适同样认识到“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的悲怆。此时的文人已不安于四书五经，一心想在疆场之上报效国家。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306 页

王维“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①]（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六），李白则希望“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②]以便“一战净妖氛”（李白《塞下曲六首》其六），高适“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③]（高适《塞上》），此时的诗人没有了只身赴死的悲情，展现的是直捣黄龙，一战平天下的豪迈。他们在烽火连天的大漠，拔剑而起，平定胡虏，功成名就。这些诗歌内容无不表现出诗人内心满腔热血，刻画出勇士们高昂的精神风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表现了他们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求。

在当时凭军功入仕的诗人中，高适可谓其中的典范。他早年仕途困顿，曾有“拜迎官长心欲碎”的屈辱，有“鞭打黎庶令人悲”的痛苦，以致他愤愤辞官而去。之后却能一跃成为封疆大吏，成为当时众多诗人中最为显达的人物，其主要原因便是他在哥舒翰幕府所立军功。

在岑参诗歌中，他除了用诗歌描绘西域广袤大地的绮丽景色之外，建功立业、为国戍边的英雄豪侠也是诗人边塞诗的一大主题，且看岑参《从军行》两首：

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其一）

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其二）[④]

国之不国，何以为家？胡人占我长安，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当然也要“万里奉王事，一生无所求”。“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⑤]是诗人舍身报国的生动体现。在“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⑥]的时代潮流中，诗人将保卫国家不受外族蹂躏与个人名族自豪感以及人生理想相结合。驱逐外敌、建功立业是诗人远赴边疆的内在精神动

①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443页
②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00页
③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189页
④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47页
⑤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6页
⑥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5页

力，他们“也知塞垣苦”，但是仍鼓起勇气和决心远赴千里之外。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①]为巩固边陲，诗人甘愿忍受胡地苦寒，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在边地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待。

“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盛唐诗人这种倾心边塞，博取功名的人生理想与来自胡人血脉中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纵然忍受不了妻儿分离，“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②]，也深知沙场征战之苦，“边庭飘摇哪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③]但这些都阻止不了他们高唱“死节从来岂顾勋”、“纵死犹闻侠骨香”。他们将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结合起来，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盛唐诗歌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2.2 临别赠言 衣锦还乡

酬唱送别诗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诗歌内容或为友人的离去而悲伤，或为下次相遇无期而惆怅。然而在盛唐诗歌之中却有一部分诗歌独树一帜，一改离别时缠绵悱恻的悲伤，而是以慷慨激昂的言辞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岑参在《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吟道：“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④]，展现了诗人对友人能够建功立业的殷切希望。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则鼓励友人“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在盛唐诗歌中这样充满英雄主义豪情的诗歌俯拾即是。

吾观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⑤]（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

六驳食猛虎，耻从驽马群。一朝长鸣去，矫若龙行云。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周粟犹不顾，齐珪安肯分。抱剑辞高堂，将投崔冠军。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令千古后，麟阁著奇勋。[⑥]（李白《送张秀才从军》）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⑦]（李白《送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1 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106 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217 页
[④]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051 页
[⑤]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621 页
[⑥]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99 页
[⑦]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798 页

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

丈八蛇予出陇西，弯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龙韬策，积甲应将熊耳齐。[①]（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二）

月蚀西方破敌时，及瓜归日未应迟。斩胡血变黄河水，枭首当悬白鹊旗。[②]（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三）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③]（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这些诗中所表现和寄托的都是对将来能够功成名就的希望。诗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情结与当时社会的游侠尚武之风是分不开的。这一方面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胡人血统，但是更多的是胡人精神气质的传入对诗人创作心态造成的变化。初盛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为“胡风”的传播和影响创造了条件。胡人多逐水草而居，其性格多豪放刚毅，崇尚武力。诗人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加之唐人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便形成了诗人在诗歌创作时的这种豪迈的英雄主义风格。

[①]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98页
[②]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98页
[③] [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055页

结语

胡汉混血的李唐王室，自高祖创业以来，在经历了太宗至玄宗多位统治者经营之后，处处洋溢着勃勃向上的生机。他们既尊重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也积极推动胡汉融合，采众家之所长，不断发展自己。在这样南北交融的开放文化背景之下，众多诗坛精英成长起来。这一时期，胡曲、胡乐风行朝野，胡衣、胡食竟为时髦，胡风、胡气广为流传，与中原文化共同演绎了一组民族大融合的交响乐。初盛唐时期所采取的“义在羁縻”和“宜与和亲”的策略使得本土以外的物品可以畅通无阻的流入内地，外来文化深深地渗透到中原的主流文化之中，这为盛唐诗歌接受胡地文化的洗礼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社会格局的开放以及唐人心态的豁达使胡风、胡俗、胡舞竞相传播。它们共同为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盛宴。

在胡地文化的影响之下，胡乐和胡舞在宫廷内外竟纷泊。在唐王室的大力倡导之下，不管是在宫廷内部还是酒家胡肆，胡乐和胡舞成为人们宴饮节庆的首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描写音乐舞蹈的诗歌内容呈现“胡化”之态势。众多文人不吝笔墨描绘和展示胡地音乐舞蹈的美妙。乐工选诗、诗歌入乐，诗歌与音乐天然的内在联系又使得诗歌的韵律节奏伴随胡乐的兴盛产生着变化。李唐一代十部乐大多源于胡地，胡乐的流行又为诗歌的创作融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盛唐社会，众多文人满怀建功立业的梦想纷纷踏上西域这块土地。这些长期受到齐梁宫体诗熏染而营养不良的诗人们，在处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广袤大地之时，其因贫血而苍白的创作细胞和创作思维得到了迅速的补充和激活，胡地山川地貌在诗人笔下充满了新奇和神秘，由此为“盛唐之音”注入了一股雄奇苍凉之劲。此外，伴随胡汉交流的频繁，大量具有胡地风情的胡物、胡俗、胡食传入内地，丰富了诗人生活内容的同时也为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和心灵依托。他们忘情于胡姬酒肆之中，沉迷于胡地佳肴。生活方式的转变直接影响了诗人诗歌创作的内容。由此，中原文人的诗歌内容便被各种极具胡地情调的物品所充斥。

诗歌创作的胡化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在“胡气”影响之下，诗人的精神世界也被感染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四书五经与纵马挎剑之间，他们义无反

顾地投身沙场，游侠尚武的风气在文人间肆虐，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展现出一种游侠好斗的英雄主义倾向。这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盛唐气象的集中体现。

当然，对盛唐诗歌的研究不应该仅限于此，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诸如盛唐社会风气的开放极盛一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种开放的风气在影响了文人生活方式的同时，对于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在历经盛唐之后，即“安史之乱”之后，伴随唐王朝国力衰退，唐代文人对胡人态度的转变对中晚唐诗歌“胡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此外，很多胡地的外来物品在盛唐时期已经传入，但是直到中晚唐时期才在诗歌中大量体现，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正如鲍鹏山在《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一文中讲到：“唐诗是一座富矿，唐代民族题材的诗歌也是一座富矿，我们期待着唐代民族题材诗歌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成为唐诗学和民族学研究中新的亮点。”[①]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关于唐诗“胡化”这一问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在这一领域披荆斩棘，收获更多的研究成果。

[①] 余恕诚，鲍鹏山．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09(1)

参考文献

[1][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清]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明]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宋]陈旸.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宋]李昉,李穆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宋]潘自牧.记纂渊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宋]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宋]王溥.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镇抚夷狄诏[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

[17][唐]段安节.乐府杂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18][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9][唐]张鷟著，田涛，郭成伟校注.龙筋凤髓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20][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2][唐]姚汝能.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历代史料笔记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唐]李濬.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4][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6]梁启超.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6
[27]任半塘. 教坊记笺订[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8]林谦三. 东亚乐器考[M]. 上海：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29]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30]严耕望. 钱宾四先生与我[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31]闻一多. 唐诗杂论[M].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32]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3]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4]陈寅格. 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5]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6]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008
[37]余恕诚. 唐诗风貌[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38]卢向前. 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论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9][美]谢弗著. 吴玉贵译.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0]王敏. 胡姬形象与西域文化的传播[J]. 新闻界, 2012, (9)
[41]王松涛. 从胡舞的流行看盛唐气象的多元性与延续性[J]，中华文化论坛，2008, (1)
[42]王松涛.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J]. 兰州学刊，2007，（8）
[43]余恕诚，鲍鹏山． 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2009，(1)
[44]高建新. “胡气”与盛唐诗[J]. 苏州大学学报，2009，（3）
[45]徐惊奇，陈霄羽. “胡风”与唐代酒文化[J]. 船山学刊，2012，（3）
[46]傅永聚. 唐代民族概念新论[J]. 齐鲁学刊，1993，(4)
[47]乌尔沁. 外来民间文化的使者“西域胡姬”—唐诗胡姬形象解析[J]. 民族文学研究，2001，（4）
[48]孙立峰. 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J]. 学习与探索，1992，（2）
[49]田峰. 从唐诗看唐代胡姬酒肆及其文化[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第 37 卷（4 期）
[50]许序雅.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论述[J]. 西域研究，2004，（1）.
[51]刘洁. 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的民族政策[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52]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J].历史研究，1982，(6)
[53]杨冬梅.唐代咏胡旋舞与胡腾舞诗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第8卷（2期）
[54]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唐代胡风”——之一胡乐胡舞[J].社科纵横，1994，(4)
[55]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56]王松涛.胡乐胡舞与唐诗[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57]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9
[58]刘红伟.盛唐诗歌与西域文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59]陈娇.试论唐代的西域乐舞诗[D].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60]刘怡茗.唐代边塞诗中的功名意识与忧患意识[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致谢

三年读研时光，转眼已接近尾声。青春总是在不经意间逝去，但不管怎样，我不会为这逝去的青春感到惋惜。回想起这三年光阴，有过无奈的彷徨，有过雀跃的欢快，也有过难忘的感动。但不论如何，在这里让我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窗外雨声淅沥，内心却有着一份躁动惊慌。论文几经周折终于即将定稿，各种毕业手续不断催促着毕业的步伐。从重返校园，到现在又即将毕业，内心似乎有着太多的话想向各位老师和同学倾诉，但又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

我的导师——成松柳教授，您在我心中如您的名字一样，如青松般让我心生敬畏，又如杨柳般让我倍感亲切。在这三年里，您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公正严明的工作作风将让我终身受益。三年的时光虽然短促，但师恩难忘，老师的教诲也将时刻铭记在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关爱。论文从选题到定稿，期间虽几易其稿，但每次您都是指出问题的同时给予我鼓励，在我毕业的喜悦之后是您无私的心血。

我还要感谢所有在学校关心和指导过我的老师，感谢你们在我学习期间以及论文写作期间给予的帮助和指导。在此祝你们工作顺心如意，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那些一起学习生活了三年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让我的学习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也让我收获了宝贵的同学情谊。虽然毕业在即，但我相信我们的同学情、同窗谊只会伴随着时间愈加的珍贵和牢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我的无私支持。岁月的痕迹在不经意间已经爬上了你们的鬓梢，我却依旧是你们割舍不下的牵挂。将来忙于工作的我也许没有很多时间陪伴在你们身边，但我将竭尽所能为你们送上更多的快乐。感谢你们。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1] 成松柳，刘康. 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J].船山学刊，2014（2）

[2] 刘康.论张籍诗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J].北方文学，2013（8）